

## “北京牌”手表

□ 合肥 日月



配图: 图文无关

近日,偶遇几个初中时代的发小。也许是因为相隔太久太久,40多年才第一次巧遇。一见面,有位发小就像放鞭炮似地一再追问我:“十几年前,虽见不到你的人,但我们至少还能经常在报刊看到你的大名,知晓你的行踪。可这些年,你怎么在报刊上‘突然’失踪了?遥无音讯,你到哪儿去了?……你还记得上初二那年吗?你有篇作文叫《“北京牌”手表》,写的是我们这代人当时对北京的向往。老师还把你的那篇作文当作整个年级的范文呢……”发小连珠似的发问,一下就把我给领进了在那激情燃烧岁月的时代记忆里……

曾记得刚上初中时,我们平时在学校里唱得最多、也是最喜欢听的歌曲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《北京有个金太阳》;上美术课画得最多的是天安门、人民英雄纪念碑;语文课本里最多的课文也是反映北京的内容。至今还有印象的有篇课文,虽然题目记不清了,但内容还是那么记忆犹新。这篇课文写的是一名北京中学生在乘公交车上学途中,路过天安门广场时,一不小心,把手上一张包油条的纸从车窗掉下,被风吹到广场上,她就从下一站下了车,返回去捡掉落在广场上的那张纸。就连上体育课,老师也是“开展象征性跑步”,带领同学们跑步到北京。一上体育课,大家就围着学校的大操场一圈一圈地跑步。我们学校的操场一圈是400米,合肥至北京的距离有1034.5公里,一堂课就是围着操场跑上个10圈,也不过4公

里。一周才一两堂体育课,像这样跑,要跑到猴年马月?为了能早点跑到北京,我们好多同学每天一早就来到学校的大操场,一圈一圈地跑……

就是在这点点滴滴、潜移默化中,给我们深深地注入了红色的基因,打下了时代的烙印。在我们灵魂深处,北京,不仅是伟大祖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是中国的首都,更是太阳冉冉升起的地方。爱北京,就是爱国家。那时最大的梦想,就是能快快长大,有机会到北京去亲身感受一下北京的伟大与神圣。

记得刚上初二那年,有一天偶然间,看到父亲有一块“北京牌”手表。我就悄悄地把父亲那块“北京牌”手表,“偷偷”地拿来,戴在细细的手腕上,仔细端详,仿佛自己已置身于北京,亲身感受到天安门的宏伟与威严;亲身感受到红墙的厚重与神秘;亲身感受到十里长安街的繁荣与美丽……眼前又仿佛呈现出开国大典的盛况,仿佛自己也融入30万军民挥舞着彩旗、彩绸、鲜花汇成的锦绣海洋之中,仿佛亲耳聆听到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!”这一洪亮的声音,久久在耳边回荡着,回荡着……我就以这块“北京牌”手表为题,把自己透过这块手表所感所思,以及眼前闪现的北京、梦中的北京,一一记录下来,写成一篇记叙文。没想到这篇作文深受当时语文老师的青睐,老师用红墨水笔在给我这篇作文写评语时,写了好长一段话。大体意思是“切口小、主题鲜明、层次清晰、语言朴实。”

## 恩师裴家同

□ 合肥 凌微涛

1984年因妻子在合肥工作,我从黄山调到合肥市手扶拖拉机厂机修车间工作。有一天我正在替车间拿报纸,忽然看到大学同学冯念军来厂找我,说合肥市书画院裴家同院长要见我。当时心想,我跟裴院长又不熟,他找我干嘛?我俩来到长江路一处很普通的楼房中裴院长家里,一见裴院长就开门见山地说:“你可愿意到画院来?”我惊喜回答:“愿意”。他又说:“你想来的话,从现在开始要创作一幅油画作品参加明年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。”我立即回答:“可以”。但一想又对院长说:“我每天都要在厂里上班,没时间啊!”裴院长说:“我来找领导和你们厂领导说一下,从现在开始借调到画院来半年,你再领点经费下去体验生活。”

就这样,我创作了油画“金秋佳音”,入选了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,调进画院后,每天就是画画,除了每周三下午去裴老家开会学习(当时画院在文联连个办公室都没有)。有一天裴老要我到市长办公室去拿一个批文,见到市长后,他给我一张批文,是给童乃寿解决一套房子。因当时童乃寿也才调进画院,住在一个集体制的小厂里,才几平方米,画画时,要卷起铺盖在床板上画。就这样,童乃寿分到了一套四室一厅的大板楼房子,为童乃寿解决了一大问题,随后童乃寿全家都到合肥来了。

后来我才知道,为了这套房子,裴老多次去找相关领导……

一九八七年,美术杂志执行编辑高名潞打电话问我,问能否搞些赞助,他想在安徽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现代艺术研讨会,我说:“试试吧”。跑赞助一定要单位支持,开介绍信才行,我把这事向裴老汇报了,裴老立即答复我说行。我很高兴,拿着介绍信四处找企业,最后跑了近三万元(在当时一万元能买一套房子),裴老也很高兴,我们就和高名潞商量一下,将会会议定在黄山屯溪召开,高名潞还请沈鹏写了会标。此

会在屯溪顺利召开了,全国各地去了近200位艺术家,如范迪安、栗宪庭、水天中、王明贤、周彦……国内一大批著名艺术理论家和目前活跃在国际、国内画坛的画家都在其中。开幕式上,裴老代表东道主发表了热情的致辞,随后我介绍了整个会议的日程安排,会开得非常圆满。会议结束后,高名潞、范迪安他们对裴老印象极好。可以这么说,没有裴老的支持,这个会是开不起来的。会议结束后,我要陪几位艺术家上黄山,裴老主动说:“收尾工作我来做。”最后,定下裴老和范迪安在屯溪处理最后的事情。

以后几年,我每次去北京见到高名潞和范迪安,他们对裴老的评价非常高。说那次会议能成功举办跟裴老的支持是分不开的,裴家同为中国的当代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二〇一八年九月中旬,我在黄山接到裴老打来的电话,第一句话就说:“凌微涛,我想你了,你在黄山不来看我啊?”我激动地说:“裴老,我也想你了。”过了几天我就去合肥看望裴老,见了面,裴老非常高兴,和我说这说那,连忙拿出一批近期创作的山水作品给我看,我一张张看后,大为吃惊,没想到裴老“老年变法”,那山那水就像喝醉了一样,如果没有极大的激情是无法画出来的,画面的现代性和传统法则碰撞形成一种独特的符号,既有传统深厚的功底又有现代音乐里的韵味,如果没有极高的艺术修养是画不出来的。裴老告诉我,这批画,他没有给任何人看过。那天,裴老与我聊了2个多小时,谈他的创作,他以后的规划,说了很多很多,看得出他很快活,快乐得像个孩子似的……裴老的新作激发了我,没过几天,我把近期作品从微信上发给裴老,请他指教,他立即详细地和我说要注意什么,要坚持什么,使我受益匪浅。

裴老的作品,裴老的言传身教,引导着我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地追求,探索,我一辈子都感谢他。裴老,我永远的恩师!

## 烧烤红薯的记忆

□ 重庆 何龙飞

在冬天,烧、烤红薯,既可潇洒视觉、嗅觉、味觉,又会体验到无尽的乐趣,是我们香甜的记忆。儿时的冬天,异常寒冷。怎样御寒呢?烧火、烤火就成了首选。我们家也不例外,在母亲的张罗下,灶膛里的干柴火燃得旺旺的,不经意间,就有了火石;父亲也是燃火的熟手,要不了多久,就把木疙瘩火引燃。出于本能,加之父母的召唤,我和弟弟赶紧凑过去,要么一起坐在灶门前的板凳上烤火,要么在灶屋一角烤木疙瘩火。很快,暖和了,自是乐在其中。

这时,父亲说:“这么旺的火,还有红彤彤的火石,浪费了不划算!”母亲见状,也有同感。“干脆弄点红薯烧来吃!”父亲和盘托出他的想法,立即得到母亲的响应。我们感到好奇,嚷着父母赶快行动。父亲动作最麻利,到红薯坑里拿了几个南脆薯回屋,选了两个大的,用火钳夹进木疙瘩火下面,塞上火石与灰,静候烧红薯的大功告成。渐渐地,木疙瘩火里散发出了清香味,沁人心脾,不能不令我们叫绝。不到二十分钟,两个烧红薯就出“火灰”了,表面炭糊状,弥漫着浓浓的薯香味,诱惑着我们,口水都快流出来了!

别慌!父亲吩咐我们等候,慢慢来,心急吃不了烧红薯。无奈之下,我们只好照办。只见父亲拿起渐冷的烧红薯,一边用嘴吹灰,一边用手撕红薯皮,小心翼翼,尽量不撕去更多的薯肉。哈哈,红黄的薯肉露出来了,不单香味扑鼻,还冒着缕缕热气呢,怪诱人的!吃吧。父亲把第一个去皮的烧红薯给了弟弟,理由是:哥哥应该礼让弟弟,这是千百年来的礼仪。哦,原来如此,我能说什么好呢,只有等待的份了。自然,弟弟“呀唔呀唔”地发声,吃得津津有味。几分钟后,我也如愿以偿地吃到了父亲撕皮后的烧红薯,感到分外香甜,分外有情趣。“还要吃!”吃完第一个烧红薯后,我们的心越来越大。父亲拗不过我们,就烧出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……直把我们吃得饱咕咕的为止。儿子们安顿好了,就该父母吃烧红薯了。于是,父母分头负责,一个在木疙瘩火里烧,一个在灶膛里烧。很快,由于技术到位,火候恰当,烧出来的红薯既香又甜还面,同样让父母吃得有滋有味,连声叫爽。至此,一家人均享受到了吃烧红薯的乐趣,尽管外面严寒,但因为烧红薯,整个身心都暖洋洋的,安逸极了。

于是,每年冬天,烧红薯就成了我们一家人操练技艺的好方式,成了一桩倍感温暖和妙趣横生的美事,成了一饱眼福、口福的乐事。就连客人来访,看、闻烧红薯后,也禁不住纷纷效仿,分享个中乐趣。同时,我们在烧红薯的快乐体验中、在父母的教诲下,不断加强学习,刻苦钻研,考上了学校,实现了人生夙愿。但因忙于学业,就逐渐与烧红薯告别了。只有回到家里时,才能看到父母烧红薯或自己烧红薯,以慰藉久违了的心灵。